

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历史考察

作者：步平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2-28

今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歪曲历史事实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做出审查合格的审定意见，激起了包括中国、朝鲜、韩国在内的亚洲及世界各国舆论的谴责。分析和批判这本教科书的一系列谬论，不能不结合日本教科书从战前、战中到战后的变化过程，不能不联系战后日本社会关于历史教科书多次发生的风波，不能不思考发生这一风波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只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对当前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 战前和战争中的日本教科书

日本的近代教育是伴随明治维新开始的。但是，如明治维新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一样，日本近代教育的特征也是以“教育勅语”为核心的充满封建因素的天皇制的教育（1）。

规定日本近代教育指导思想的是1890年颁布的明治天皇的所谓“教育勅语”。之所以颁布这一“教育勅语”，主要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明治维新后确立的天皇制以及天皇的统治地位，因此，“教育勅语”是立足于建立以天皇为顶点的日本大家族的民族共同体的思想体系，即“家族国家观”对日本人规定的必须无条件遵从的国民道德规范。“教育勅语”强调的核心内容就是“一旦有事发生，必须以义勇奉公的精神，保卫天地无限的皇运”，“在发生战争时，必须为天皇尽忠尽义，保卫国体”。也就是说，“教育勅语”是要日本人从学生时代起就把忠实于天皇，为天皇献身作为最高的道德精神。不过，日本的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贯彻“教育勅语”不能只限于理论层面上的探讨和研究，更重要的是应成为日本国民的普遍意识和信念。而做到这一点，一是需要建立一整套教科书编写、发行和使用的原则，一是在教科书的内容中贯彻以天皇为统治核心的“皇国史观”教育。因此，“教育勅语”颁布后，日本政府逐渐加强了对教科书的“统制”，主要的标志就是实施“国定教科书”制度和推行“皇国史观”教育，这两点也构成战前和战争中日本教育的基本特征。

在教科书的编写、发行和使用的原则方面，日本教育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定教科书”制度。随着明治政府统治的加强，特别是“教育勅语”公布后加强“皇国史观”教育的需要，日本政府在1903年4月修改了“小学校令”，规定“文部省对于小学教科书拥有著作权”，这就是说，小学的教科书必须由文部省编写，而所有小学必须使用这种由文部省编写的教科书，不能再选择其它的教科书，因此也阻止了教科书的自由编写。这种由文部省代表国家编写的教科书就是所谓的“国定教科书”。学校只能使用“国定教科书”而别无选择的教科书制度就是“国定教科书”制度。1943年，日本中学的教科书也改为“国定教科书”。“国定教科书”制度保证了“教育勅语”的贯彻，也为日本政府向国民强制灌输“皇国史观”提供了行政手段（2）。

关于“皇国史观”的内容，充斥于战前各种教科书中，而在“修身”、“国语”和“历史”等教科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修身”课是日本战前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课程，是直接体现日本政府的意志和“教育勅语”精神的。所以，强调“皇室中心主义”的“修身”课国定教科书的编写最受重视。关于日本的历史，“修身”课本主要讲述天皇的世系，向学生灌输日本天皇是神（天照大神）的后代的思想，把传说中的人物神武天皇作为创建日本的天皇加以宣扬，让学生们向其顶礼膜拜。于是，记载在日本古代的典籍《日本书纪》和《古事记》中的日本开国的神话传说，包括公元前660年的日本建国，都赫然地写入教科书，“神之国的观念被强制性地灌输到日本的儿童中。当时的历史教科书第一章就是“天照大神”，说天照大神是光耀世界的太阳，高居天上，普济众生，是天皇祖先。接下去讲天皇的世系，颂扬历代天皇的圣明和天皇治下的日本的伟大。教科书中反复出现这样的内容：“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的好国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国”，使日本人从儿童起就建立“生在皇国的光荣”的观念。

战前的“国定教科书”不仅把天皇家的存在与作用作为整个日本历史的中心事件来描述，更重要的是把维护“皇室的尊严”、忠诚于“天皇的神格化”、对天皇的“忠义”、“孝行”等作为国民重要的道德内容讲述和约束。因为一旦把天皇定位在神格上，要求人们对其无条件的崇拜就有了“理由”，而孝忠于天皇就是孝忠于神，所以“国定教科书”重点是鼓吹忠实于神格天皇行为的行为。

在初期的“国定教科书”中，颂扬楠木正成和楠木正行父子对天皇的忠诚和献身，颂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本军人的献身行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日本政府要求这一期的“国定教科书”必须对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加以阐述，给予论证，以便动员日本国民积极投身于到战争中。特别是当时的日本陆军中流行狂热的超国家主义的思潮，狂妄地鼓吹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所以，这一时期“国定教科书”也相应地注重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想体系构筑，对忠君爱国的精神和“皇国臣民”的道德标准都力图从“肇国精神”的角度给予哲学性的解释。

“肇国精神”说的就是神格化的神武天皇开国的事迹，通过教科书歌颂他创建日本的“丰功伟业”，一方面进一步加强“神之国”的观念，另一方面则是在亚洲建立超国家的“大东亚共荣圈”做舆论宣传，鼓动日本国民积极投身战争（3）。

在这一时期，教育与战争的联系已经不是间接的，教科书中充斥了军国主义的精神，如宣扬“八紘一宇”，给“大东亚共荣圈”寻找正统化的根据；对“神风”精神大加颂扬，强调对“靖国神社”的崇敬的对“靖国精神”的效仿等，竭力证明为天皇献身成为“英灵”才是对“皇国臣民之路”的正确实践。所以，这时的“国定教科书”是鼓动日本年轻一代参加侵略战争的重要的宣传工具。

由此可见，对于加强天皇的政治统治和地位，对于日本军国主义道路和实行对外侵略的战争政策，建立在“教育勅语”和“皇国史观”原则上的“国定教科书”所起的作用是什么事物所不能取代的。

日本战前到战争中的教科书立足于“皇国史观”的教育，即首先从“天皇是神”的基本点出发，宣扬天皇统治地位的天然合理；接着鼓吹对天皇的无条件服从、信仰和崇拜，对天皇领导的“神之国”的忠诚。这种思想其实也就是日本右翼思潮的基础，很容易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超国家主义。日本战前右翼团体代表人物的思想尽管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都是典型的而且是顽固的“皇国史观”论和“国体论”的崇拜者，他们从维护天皇制的国粹主义出发，经历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到大亚细亚主义，对日本的军队和政治以巨大的影响，这是走向战争的重要思想基础

(4)。对于这一论断，曾经有许多日本人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予以证明。

日本著名的教育家山住正己曾经对“国定教科书”压制人们的个性和理性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样的教科书在日本社会的贻害无穷(5)。有过战争的经历的若槻泰雄曾经分析道：日本的军人“从青春期开始就被反复灌输这样的观念，即‘我们的国体是令人敬畏和万邦无比的’、‘八紘一宇的肇国精神’、‘建国以来光辉不灭的精神’、‘(天皇是)令人敬畏的现人神’等。他们一年到头反复地聆听这样的训示，而且要笔直地站立，从未有过怀疑，当然更不可能批评或批判。几十年中，他们就形成了这种无知、无教养和偏见的思想”。若槻指出：这种思想则导致他们头脑的“发狂”、“疯狂”、“精神异常”，导致他们对战争的狂热(6)。

二 战后日本教科书的“改善”和“改恶”

战后，在日本政治改革和国内和平民主运动活跃的背景下，上述导致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教育制度和教科书肯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1945年10月起，盟军总司令部陆续发表了关于日本教育的四大指令，对于摧毁日本天皇制的法西斯教育起了重要作用。从此，天皇的“教育勅语”被废除；作为宣扬军国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神道思想的主要工具——修身课——被停止；军国主义的和超国家主义思想被禁止散布(7)。但是，在日本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当然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围绕教科书制度与教科书内容的斗争便贯穿了战后整个日本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出现了日本教科书的“改善”和“改恶”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方向。

在教科书制度方面，战后最大的变化是从1948年开始，“国定教科书”逐渐向“审定教科书”转变，即原来政府把持的编写教科书的权力逐渐向民间转移，学者可以自行编写教科书。学者编写的教科书经交文部省审查合格后可在出版社发行，学校根据自己的愿望从审定合格的多种教科书中选择愿意使用的一种。虽然文部省设立教科书调查官和教科书审定审议会对提交的教科书稿本进行审定，但是比起战前后战争中的“国定教科书”制度，“审定教科书”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制度上应该说还是一种“改善”(8)。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定对于许多日本的历史学者来说是实现了他们多年来向往的学术自由和教育自由的理想，于是，各种民主的研究团体、研究会如雨后春笋般地组织起来，开始了在编写历史教科书方面的努力。随着日本战后的和平运动的发展和和平反战力量的壮大，“国定教科书”占据的比例在开始减少。下面的数字说明了这一情况(9)。

年代	“国定教科书”发行量比例(%)	审定教科书发行量比例(%)
1949	80.2	19.8
1950	46.9	53.1
1951	19.0	81.0
1952	2.6	97.4

可见，到50年代初，“国定教科书”在教科书的发行量中所占比例已经微乎其微了，说明审定教科书的制度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一趋势必然引起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恐慌，而这种恐慌则表现在掌握教育大权的文部省制定严格的教科书审定原则，给提交审定的教科书制造种种障碍和限制。同时，文部省还对选择教科书的方式方法加以调整，力图限制最基层的学校对教科书的选择权力，而尽量将选择权集中在文部省容易控制的地方教育委员会手中。

如在保守的自民党在形成期间提出“刷新文教、整备设施”的口号，把实现日本义务教育教科书的“民编国管”作为该党的政治方针之一。“民编国管”的涵义是：1、日本的义务教育即小学和初中的教科书虽然可以由民间编写，但是种类不宜过多，1—3种即可；2、必须由文部大臣审定；3、选择教科书的权力统一到都道府县的教育委员会。可以看出，如果按照这一“民编国管”的原则，日本的教科书制度实际上又回到了“国定”的时代(10)。

又如，文部省给予对教科书进行审定调查的“教科书调查官”以相当大的权力，他们的口头意见就可以决定教科书是否合格，掌握了对教科书的生杀与夺的大权。而文部省可以根据自己的评价标准选择符合需要的教科书调查官。战前就是日本著名的“皇国史观”的鼓吹者的平泉澄的弟子村尾次郎就曾经长期担任调查官，他的政治态度相当右倾，而且公开声称“我就是皇国史观论者，我就是国粹主义者。国粹主义有什么不好？”显然，这些人的政治态度预示着日本教科书将面临的严峻的考验(11)。再如，文部省多次修改确定教科书编写方针的《学习指导要领》，这一《要领》要求教科书应“提高年轻人对国家的关心程度，让他们保持旺盛的精神和志气”，应“培养日本年轻人的爱国精神”，甚至提出“为了加深历史教育，应当深化对天皇的理解和敬爱”。这样的方针实际是竭力将战前教科书宣扬的国粹主义、“神国精神”等正当化，给用神话鼓吹天皇制度和皇国史观的教科书以公然登堂入室的机会(12)。战后，日本的进步的和平民主力量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为冲破审定限制而与右翼保守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斗争主要围绕教科书中军国主义的宣传、“皇国史观”的教育和战争责任的认识等问题。战后50多年来，进步力量与右翼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斗争呈现波动局面，因此日本的教科书也相应出现了总体上的“改善”或总体上的“改恶”的局面。一般认为，战后日本教科书出现了三次大的动荡，因为右翼与保守势力对改善的教科书发动过三次大的攻击。

1955年起，日本政府制定的教科书的审定标准和“学习指导要领”发生根本的转变，规定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称为“对大陆的进出”，为掩

盖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定下了基调。而根据新的教科书审查制度，80%的新编写的教科书被认为“不合格”。这被认为是对教科书的“第一次攻击”，结果是导致了持续15年左右的教科书的“冬天的时代”，即教科书的“改恶”（13）。1965年，以家永三郎为代表的日本进步力量对右翼抗议文部省的审查向法院提出诉讼，1970年东京地方法院判家永胜诉后，文部省的审查有所缓和，教科书关于日本侵略事实的记载有所改善。从1974年起，部分中学和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中开始有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以后记述日本侵略罪行的教科书也越来越多。

80年代中期，右翼和保守势力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忘乎所以，要求对历史进行“总决算”，即对侵略罪行进行翻案，开始了第二次对教科书的大规模攻击。文部省再次强化对教科书的审查，要求从教科书中删除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731细菌部队以及冲绳作战等关于日本“加害”的记述。由于这一举动遭到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当时的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谈话，表示今后的教科书审查要考虑近邻国家国民的感情。家永三郎也同时提出第三次诉讼，明确要求判定文部省的除要求违法。1997年，日本高等法院对家永三郎的第三次诉讼做出判决，判定家永三郎在“南京大屠杀”、“731细菌部队”、“日军对妇女的暴行”等4个问题的记述上是正确的，而文部省是违法的（但仍判定教科书审查制度合法）（14）。经过这场斗争，教科书的内容又有了明显改善。90年代初，基本所有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和6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共7种）都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在数字问题上有差异）；日本高中的23种日本史教科书和初中的7种历史教科书（全部）都已经记载了“从军慰安妇”的问题，世界史教科书中也有8种加以记载；多数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和1种初中教科书开始记载731细菌部队的暴行。可以说，这是战后教科书在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上出现的最好的局面。但是，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正是针对这一改善局面向教科书发起了第三次攻击。

第三次对教科书的攻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右翼和保守势力把目标放在将于2002年使用的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上，攻击正在使用的1997年版7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主要的目标是攻击这些教科书中记载的以“从军慰安妇”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等为代表的日本的侵略罪行问题。

这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发生在冷战结束和世界进入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国际背景下，也发生在日本经济多年停滞、社会不安的国内政治背景下，在这种形势下滋生的泛滥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自由主义史观”思潮为右翼和保守势力提供了理论工具。

正是在右翼和保守势力的第三次攻击下，1997年版的教科书在申请2002年的审定的时候，将其内容进行了改动，在许多涉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的记述上比原来有明显的退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只有日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还保留了这一记载。关于从军慰安妇问题的记载，新版的教科书送审本保留这一记载的只剩下三种了。另外，关于“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关于侵略行为的记述，2002年送审本与1997年版教科书相比，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当前出现的“教科书改恶现象”（15）。

三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

右翼与保守势力对教科书的改善倾向发动的第三次攻击与前两次比较，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右翼与保守势力气势汹汹地直接赤膊上阵，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并交由日本扶桑社（《产经新闻》的背景）出版社会科（包括《历史》与《公民》）的教科书。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集中反映了9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在教科书问题上的观点，最明显的就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和篡改。这部教科书歪曲的历史事实涉及到许多方面，中国外交部对于其歪曲历史事实的问题提出8个方面的修改意见，韩国政府则对其数十处地方提出了明确的修改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涉及到以下问题：

1 否认发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和“上海事变”等是日本军队的阴谋和对中国侵略的性质，而说成是中国的挑衅，把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美化为“以建立近代国家为目标”的行动，把对朝鲜的占领和强制吞并美化为“开发”。

2 鼓吹日本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自卫”战争，“大东亚战争”；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胜利“激励了东南亚甚至非洲人的独立愿望与勇气”；甚至说“1960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殖民地独立的宣言与大东亚会议的宣言是一致的”。

3 强调日本在战争中的“被害”，而掩盖甚至否认日本军队的加害行为；关于强抓中国和朝鲜劳工的问题，根本没有记述；关于强制妇女作为“从军慰安妇”的问题，在编写前就造出舆论反对记载；而关于南京大屠杀，只在讲战后的国际审判时从否定论的立场上提到。相反，却罗列日本方面因战争“死亡、失踪的军人及文职人员186万，平民约66万”的具体数字。

4 否定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正义的审判，诱导人们怀疑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以上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歪曲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主要方面，这是比较容易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还要分析这部教科书的编写思想，分析编者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将其放到从战前、战争中到战后日本教科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从这样的考察中，人们会发现这部教科书的历史观是对战后历史认识的严重倒退，而这是更加危险的问题。

这部教科书的前言——“关于学习历史”——是编者关于编写思想的说明。在这里，编者公开地称：“一说到学习历史，大概很多人就会认为是了解过去的事实。其实并不一定是那样。所谓学习历史，关于过去的事情，其实是要学习过去的人们是如何考虑事情的。”（16）在编者看来，学习历史的目的是要学习过去的人们是如何思考的，不管过去的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有什么样的局限，失误或问题，只要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即使是神话、传说，也有其存在的合理因素，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价过去的不公和不正。从方法论的角度，这种认识是典型的否认客观事实的唯心主义的理论，其目的显然是要对书中大量地使用毫无根据的神话传说，狂热地宣扬“皇国史观”和“神之国”的观念从而否定战后审判的结论制造理论基础。

翻开这部教科书，里面杜撰历史，宣扬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论，鼓吹日本国家和日本文明的优秀性，把有关日本起源的神话传说作为历史事实的记载比比皆是。

比如，在这部教科书的开头就提出，就文明的发展来说，日本的文明早在欧亚大陆的四大文明（中国、埃及、印度、巴比伦）之前就出现了，说

大陆文明都是“沙漠与大河的文明”，而日本的文明是“森林与岩清水的文明”（17）。与战后的多数教科书不同的是，这部教科书根本否认中国文化同日本文化的联系与影响，强调日本列岛构成一个“独特的文明圈”（18）。为了说明日本文明的起源，这部教科书列举了日本1993年以来曾经轰动一时的高森遗址和上高森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证明在50—60万年以前日本就有处于原人阶段的人类，可与中国周口店的北京原人，印尼的爪哇原人相提并论。

关于日本国家的产生，这部教科书的编者为了证明自己构筑的日本“独特的文明圈”的理论，当然需要制造出一个有悠久建国历史的日本，于是同战前的教科书一样，神武天皇的“东征”和公元前660年2月11日的“建国纪念日”就都被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教科书，在原封不动地引用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后，编者还加上了如下的说明：“以上是古代的传说。所以，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还不大知道，有人认为是虚幻的。但是，（上述记载）可以认为可能是反映了神武天皇的势力从九州向近畿移动而建立大和朝廷的事实。”

历史教科书历来被认为是应当严肃、科学和严格尊重历史事实的，尤其是面向中学生的教科书，更需要使用已为科学研究充分论证的历史事实。而在这部教科书中，描述历史居然使用“可以认为”、“可能是”等等词语，唯心主义的味道实在是太浓了。而且相当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部教科书刚刚编写出来送交文部科学省审定的时候，日本的媒体突然爆出了令人震惊的新闻：上高森遗址的考古发现原来是假的。

当然，对于不大了解日本的历史与文化的人们来说，仅仅举出上述的问题，似乎还不能充分理解教科书的危险性。但是，一旦按照这部教科书上述对日本古代历史的描述思路发展下去，就会发现被引入了“皇国史观”的体系。果然，接下去，在教科书中就赫然出现了“日本的神话”，为“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等专门安排了章节；在进入近代史的部分后，旧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被推崇为“亚洲最初的近代宪法”；二战后被明令禁止的“教育勅语”竟然全文刊载在教科书上，称这一“教育勅语”成为近代日本人人格的支柱。再下去，关于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和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这部教科书就完全向学生描述所谓“过去的日本人”是如何思考的，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战争时期的“大东亚战争史观”。

由此可见，这部教科书对日本古代历史所进行的描述，对“天皇为中心的神国”的描述其实是在为其思想体系做铺垫，而这种思想体系，就是战前日本右翼的思想体系，日本右翼的代表人物影山正治在阐述其国粹主义的思想核心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天皇的神圣性，他认为不应把《古事记》看作单纯的“古典”，而应作为“神典”来信奉（19）。而这种思想体系是把日本引向战争之路的思想体系，如果结合战前和战争中日本教科书来考虑，就会看到这部教科书的真正的危险所在。

四 围绕日本教科书产生风波的实质

了解了战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曲折过程后，人们不难看出，所谓“教科书问题”，就是由右翼和保守势力一再对教科书在战后的改善趋势进行攻击产生的。教科书“改善”与“改恶”的焦点问题，一是如何认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也就是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否真正反省的问题，一是关于日本是否是“神之国”的问题，也就是对战后日本宪法的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联系教科书的历史，也可以看出，实质性的问题就是是否退回到战前和战争中的宣扬“皇国史观”和鼓吹军国主义精神的教科书上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本身是紧密联系着的，而且反映了日本当代政治发展的动向。教科书的“改恶”现象，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表现。

关于日本“神之国”的神话，其实自日本战败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开始就已经破产了。制造“神之国”的神话，原本就是为了强化天皇的统治地位，所以战前和战争中的教科书才有神武天皇等那些神话传说的地位。战后的天皇既然失去了“神格”和对日本统治的权力，“神国”自然无由存在，日本的历史当然要从事实根据开始，这是不争的事实。“新教科书编纂会”的教科书中再次把关于日本开国的神话写进去，并不是什么新的创造，其实是战前和战争中宣扬“皇国史观”历史教科书的翻版。

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应当说在东京审判中就已经确认了，《旧金山和约》第11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在日本及其它同盟国设立的法庭中日本战争犯罪的审判……”。但是，战后审判也有许多遗留问题：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没有追究日本违背国际公约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的责任；没有追究日本对亚洲各国的违反人道的犯罪责任（包括从军慰安妇、强征劳工等等）。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东京审判的资料没有公开，对这些问题被免除战争责任的原因和内幕难以进行深入的追究。由于这一原因，加上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活动，日本国民的普遍的战争责任意识并没有建立起来。战后日本的和平运动在国民中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多从“被害”的立场出发，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认识淡薄。70年代后半叶，保存在美国的有关档案陆续公开，而日本的学者从80年代开始得以往美国查阅那些资料，颇有收获。栗屋宪太郎（立教大学）、田中裕（一桥大学）等从那些档案中发现了美国包庇日本天皇和部分重要的战争罪犯的战争责任的证据，开始对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行追究。特别是昭和天皇1989年去世之际，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重新思考其战争责任的热潮，日本社会也受到影响。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关于731细菌部队和化学战的新资料以及日本政府和军队强征从军慰安妇的新资料都有新的发现，特别是由进步学者组成的“日本战争责任中心”在搜集侵略战争罪证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这种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和天皇的战争责任的深入追究，使坚持大东亚战争史观和拒不承认战争责任的右翼和保守势力感到了恐慌。

另一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局面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原来呈高速发展状态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长期停滞，引发了日本社会的焦虑情绪。而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教育方面的问题十分严重。近年来日本学校中出现的一些反常现象，如学生不关心国家和社会，不遵守学校纪律和社会公德，逃学和暴力行为等等，相当多的学校由于学生强调自我，导致老师不能也不敢管理，秩序混乱，授课难以正常进行。这些现象被称为“教育危机”和“教育荒废”。本来，这些现象是日本社会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以及深刻的社会矛盾在学校中的表现，但是“自由主义史观”和“编纂会”将这些问题出现归咎于教科书，称反映了日本侵略和加害历史的教科书使日本的年青人产生了对自己祖国的反感甚至仇视，必须从改变教科书的记述入手挽救教育的危机。这就是从思想上支撑“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日本自由主义史观对日本教育的认识，他们以为在教科书中掩盖侵略的事实，掩盖日本人的战争犯罪，掩盖当代政治家的腐败渎职等齷齪事件就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那样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新的国家主义和排外主义，重新犯历史的错误。

事实上，新的国家主义和排外主义思潮在日本已经有所抬头了。近年来，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日本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调日本在国际上的贡献的思潮，强调日本负担了战争经费的20%以上，达到130亿美元；一些人因自卫队参加了联合国的维护和平的行动（PKO）和派扫雷艇到了波斯湾而感到头脑发热。这些人认为实现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本来是指日可待的，但国际社会仍然对日本的国际贡献视而不见，日本没有得到相应的报答，包括没有得到在联合国中更加重要的位置和发言权。而日本国内的和平思想与和平宪法也被他们视为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障碍。于是，他们在所谓解决“教育危机”的名义下，向日本的进步力量发动了攻击，掀起了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以达到“名正言顺”地对外派兵的目的的种种活动。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政治要求和运动需要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民族主义情绪又需要自由主义史观的引导。在

这些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出现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

注释：

- (1) [日] 仲新：《近代教科书的成立》，讲谈社，1949年。
- [日] 大田尧编著：《战后日本史》，岩波书店，1978年。
- (2) [日] 唐泽富太郎：《教科书的历史》，创文社，1963年。
- (3) [日] 海后宗臣、仲新编著：《日本教科书体系·近代编 历史·国语·修身》，讲谈社，1963—1964。
- (4) [日] 天道是：《右翼运动一百年的轨迹》，立花书房1997年版，第21—23页。
- (5) [日] 山住正己：《教科书》，岩波书店，1970年，第72页。
- (6) [日] 若槻泰雄：《日本的战争责任》，原书房，1995年。
- (7) [日] 德武敏夫：《教科书的战后史》，新日本出版社，1995年版。
- (8) [日] 山住正己：《教科书》，岩波新书，1970年版。
- (9) [日] 德武敏夫：《教科书的战后史》，新日本出版社，1995年版。
- (10) [日] 日教组：《现行教科书制度的诸问题》等。
- (11) [日] 家永三郎：《教科书裁判》，日本评论社，1981年版。
- (12) 《日本教育新闻》，1956年6月7日。
- (13) [日] 森川金寿：《教科书与裁判》，岩波新书，1990年版。
- (14) 教科书辩护团、支持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全国联络会声明，1997年8月29日。
- (15) 步平：《日本的教科书问题》，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四期。
- (16) (17) [日] 伊藤隆等：《历史》教科书，扶桑社2001年版。
- (18) [日] 西尾干二：《国民的历史》，产经新闻社，1999年版。
- (19) [日] 影山正治：《向神话学习》，大东塾出版部。

文章录入：zhangzhiyong 责任编辑：zhangzhiyong

- 上一篇文章： 评介俵义文先生的新著——《彻底剖析危险的教科书》
- 下一篇文章： 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 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深层思考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